



OSID

新冠肺炎疫情的战争隐喻及其影响

刘建稳^{1,2}, 钟伶俐²

(1. 武汉轻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48; 2. 湖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2)

摘要:战争隐喻的基本功能是唤起大众心中的恐惧感和紧迫感,充分突显目的域所描述事件带来的威胁。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将有关战争的推理模式迁移到疫情防控上,构建了基于战争隐喻的抗疫现实;同时,战争隐喻框架赋予新冠疫情之非常举措以合理性和正当性,从而形成令行禁止、有呼必应的局面,为新冠疫情的有效防控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战争隐喻对激起全民抗疫的热情有其积极的影响与意义。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战争隐喻;框架;影响

中图分类号:H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22)01-0048-06

2019年末以来,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尽管其基因序列已基本确定,与历史上的多次大规模传染性疾病一样,但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新冠病毒在大众的认知中还是被赋予了很强的神秘色彩。因此,对于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必须借助现有的、比较熟悉的事物或现象来描述它。由于神秘性是隐喻的滋生地^[1],所以隐喻自然成为描述新冠肺炎疫情的有力工具。不约而同地,国内报刊普遍采用了战争隐喻的表达:

例1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激扬广大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精气神,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湖北日报》,2020-01-31)

例2 在你们眼里,我们是医生,你们是病人;而在我们心中,我们就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新冠病毒就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人民日报》,2020-03-04)

例3 武汉是湖北作为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决胜之地的主战场。(《湖北日报》,2020-02-17)

例4 由瑞金医院副院长陈尔真挂帅的第二批医疗队接管武汉第三医院光谷院区多个重症病区。(《人民日报》,2020-03-04)

新冠肺炎疫情被概念化为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将帅(医院领导、医学专家)带领广大战士们(医护人员,也包括病人)在战场上(疫区、医院)同敌人(新冠病毒和新冠肺炎疫情)进行英勇斗争。

人们借助战争的概念框架去思考、讨论,进而体验和应对新冠疫情。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中,战争隐喻框架提供了分析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重要思路,甚至唯一思路。

一、战争隐喻的普遍性和有效性

(一) 隐喻及其推理作用

隐喻不仅是修辞手段,更是重要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借助一个认知域的事物(通常比较熟悉、相对具体)去思考、讨论、体验另一认知域的事物(通常比较陌生、相对抽象)。当然,隐喻不是两个事物属性特征之间的简单比较,它更侧重事物间构成要素及其结构/关系上的相似性^[2],其最重要的功能是将源域(比如战争)的推理模式映射到目的域(比如疫情),进而帮助人们以这种方式对目的域进行推理,否则也无法加以推理^[3]。因此,隐喻能够帮助人们有效理解和应对各种复杂、陌生的情形^[4]。为了清晰地认识或阐释某一事物(目的域),人们往往根据其特性、结构或与其他事物的关系,或根据自己的目的(说服、欺骗等),选择某个有别于目的域的物体或事件(即源域)对其进行描述。源域的选择决定了隐喻的效果^[5],而推理模式的保留意味着人们对源域的观点和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如何看待目的域^[6]。

隐喻作为建构论点的重要方式,为社会语境下意义的建构提供了有力的工具^[7]。重大社会事务,

收稿日期:2021-06-16

作者简介:刘建稳,博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钟伶俐,博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话语分析、外语教学。

比如公共卫生事件、公共安全等,由于其本身的抽象性和复杂性,对它们的理解和处理常常需要借助隐喻。隐喻框架的选择决定了大众会对它们形成什么样的认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此外,隐喻框架的效果明显而隐蔽,即人们在使用隐喻来理解和解决问题的时候很少意识到隐喻的存在^[8],这给话语创造者带来了很大的操作空间。

(二) 战争隐喻的普遍性

人们常常将艰巨、紧迫、对抗性的任务概念化为战争^[9],几乎每个会话领域都离不开战争隐喻^[10],比如吵架/辩论、体育竞技、贸易冲突、外交争端等,涉及日常生活、政治外交、商业贸易、体育比赛等。

战争隐喻之所以被普遍使用,主要得益于两点原因。一是战争隐喻利用的图式知识都很基础且广泛共享,在面对纷杂万象时,正是这些知识有效地构建了人们的推理能力和交际能力;二是战争隐喻准确地传达了某种紧急、消极的情绪基调和恐慌氛围,进而迅速吸引大众注意力并激励人们采取相应的行动^[11]。

汉语中的战争隐喻尤为丰富。几千年来,不断完善军事理论和不计其数的战争给汉语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很多和战争有关的概念和词汇已经成为汉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战争,特别是人民战争,得以不断丰富、发展,相关理念构成了社会群体自我形象的基础,并通过特定的话语(包括隐喻)构建社会群体的行为及其价值观^{[12]115-140}。

(三) 战争隐喻框架的有效性

框架是由经验抽象而成的图式结构,用以表征某个事件、物体、情形或事态,是理解事物的重要认知组织工具。框架的组成部分称作框架元素(对应具体的语义角色),这些元素由词汇编码,每个词汇都会激活某个特定的框架^[13]。以战争框架为例,其主要元素包括战士、敌人、武器和战场等,其中任何一个元素都能激活战争框架;元素之间的关系体现为敌我双方手持武器在战场上对抗。

框架在认知上优先于框架元素,具有更好的典型性;元素根据它与框架的关系而确定^[14]。同时,作为一种心智结构,框架决定着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进而决定了人们的判断和行为方式^[15]。

框架常常是隐喻性的^[16],它在阐述抽象、复杂或新生概念(比如政治理念、突发疫情等)时十分有效。以战争隐喻框架为例,疫情中的新冠病毒是敌人,在认知上最为突显,激活了战争框架及其整个框架网络;战争有关的推理结构也随之激活,比如战争

必然会引起伤亡等。战争隐喻框架运作机制的核心在于话语创建者试图借助战争隐喻充分发挥话语的劝说功能。因此,战争隐喻框架有利于大众在最短的时间内对新冠肺炎疫情形成最基本的认知,并帮助其接受政府在非常时期所采取的一系列非常举措。

此外,隐喻框架的操作性很强,这可以通过框架的程序性功能看出来:识别问题、分析问题、道德评价和解决问题^[17]。隐喻框架的功能主要源于隐喻的压制功能,一旦源域选定,它所激活的框架就能够压制受众后续接收的信息,使它们同隐喻暗含的关系结构相匹配^[8],进而引导受众按照源域的推理模式对目的域进行判断和处理。

二、新冠肺炎疫情的战争隐喻

(一) 疾病防疫与战争战事

疾病战争隐喻和微生物有着紧密的渊源。1864年,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向公众介绍其全新的疾病病菌说时,首次使用了“入侵”的比喻。最具代表性、影响最为深远的疾病战争隐喻的提法则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于1971年向癌症“宣战”,并将其称为“残酷、阴险的敌人”^[18]。此后,人们往往将治愈率低、致死率高、传染性强的疾病称为“战争”;疾病战争隐喻甚至成为人类底层认知的一部分。

瘟疫和战争一直是人类面临的重大难题,二者纵横交错,既有因果邻近关系,又存在结构上的相似关系。一方面,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像战争这种大规模的灾难,往往在短时期内造成大量人员死亡,得不到及时掩埋的尸体腐烂后产生病菌,进而引起瘟疫。除此之外,有时瘟疫还和战争交织在一起,前者成为后者的手段,后者成为前者的形式(比如惨无人性的日本731部队的细菌战)。另一方面,在医学领域,战争隐喻是常见的叙事方式:传染性疾病会“入侵”人的身体,常常被视作“威胁”;“白衣战士们”向它们发起“进攻”,为了“保卫”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他们“冲锋在前”,在和疾病的“抗战”中涌现出很多令人敬佩的“英雄”;有些“白衣战士”“牺牲”了宝贵的生命,被迫授为“烈士”;做出突出贡献的医护人员荣获“军功章”;患者幸存下来,被认为“战胜病魔”;如果某个地区或国家的疫情被完全控制,往往称作“取得全面胜利”。

(二) 新冠肺炎疫情的战争隐喻框架

1. 新冠肺炎疫情战争隐喻框架的精细化

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当天,新华网发表了题为“以非常之役迎战非常之疫”的时评文章,首次提出“战疫”的概念,正式拉开了新冠肺炎疫情

“阻击战”的序幕,同时为本次疫情的话语提供了战争隐喻框架。根据框架的程序性功能,战争隐喻能够迅速帮助人们识别“敌人”(新冠病毒/新冠肺炎疫情)、诊断疫情原因^[17](新冠病毒源头未确定)、做出道德判断(新冠病毒严重危及人民生命安全)、

提供解决方案(封城、居家或集中隔离)。不难看出,战疫的源头在新冠病毒(疾病)突发,战疫的关键在救治患者(医疗)、防止疫情蔓延,战疫话语的框架是战争。本文所涉核心概念的主要框架及其元素见表1。

表1 本文所涉核心概念的主要框架及其元素

元素	战争框架	疫情框架	医疗框架	疾病框架
主要参与者	敌人、战士、指挥官	传染性疾病、政府领导、医护人员、患者	疾病、医生、患者	病菌/病毒、免疫系统(细胞)
场地	战场、前线、后方、指挥部	疫区(含医院、社区、村庄)	医院(门诊、病房)	患者身体
物资装备	武器、军粮	传染病应急物资(特需药品等)、生活物资	药品、医疗设备	淋巴细胞、巨噬细胞
方法	战略、战术	防控方案	诊治方案	发烧、干扰素
过程	防御、进攻	突发、消杀、诊治	检查、治疗	吞噬病菌/病毒
目的	战胜敌人	清除疫情	治愈病人	清除病菌/病毒
结果	战胜、战败	结束(或持续)	治愈、死亡	清除或受损
类型	正义或非正义;常规或非常规(核战争、生物战);防御战(阻击战)或攻击战	突发或普通	急诊或门诊	急性或慢性、感染性或非感染性、重症或一般疾病

前文讲到,疾病战争隐喻肇始于巴斯德的病菌“入侵”说(属于本体论意义上的“疾病战争隐喻”),发迹于尼克松的向癌症“宣战”(属于“医疗战争隐喻”)。这两类战争隐喻的焦点多为疾病本身。不同的是,疾病战争隐喻的敌对双方为“疾病(病菌)”和“免疫系统”,医疗战争隐喻的敌对双方则为“医(生)患(者)”和“疾病”。本文讨论的新冠肺炎疫情战争隐喻更突显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属性,其敌对双方主要为“政府领导+医护人员”和“新冠肺炎疫情”,

可称之为“疫情战争隐喻”。从表1可以看出,从“疾病”到“医疗”,再到“疫情”,三个框架的“参与者”“场地”“物资装备”等核心框架元素逐步增多或扩大,它们之间存在外延上的包含关系。由此以来,它们各自的战争隐喻框架也必定存在包含或重叠关系(三者都涉及某种疾病,都涉及病人)。此外,表1是高度图式性的,从隐喻框架的角度看,源域的框架是“战争”,目的域的框架是“疫情”。根据战争和疫情的相互关系,将表1中的框架及其元素细化,可以得到表2。

表2 战争框架和新冠肺炎疫情框架(细化)

元素	战争框架	新冠肺炎疫情框架
参与者	战士、敌人、指挥官	新冠肺炎、新冠患者、(重症医学/呼吸科)医护人员、官员
场地	战场、前线、后方、指挥部	疫区、医院(病房)、疫情防控中心
物资	武器(枪支弹药)、军粮	医用口罩、防护服、护目镜、人工肺、呼吸机、消毒药物/剂、疫苗
方法	战略、战术	封城(封闭疫区)、隔离
过程	开战、防御/进攻、胜利	暴发、抗疫、结束
目的	战胜敌人	消除病毒,救治患者
结果	胜仗、败仗	疫情结束、疫情继续
类型	正义战争;非常规战争(核战争、生物战);防御战(阻击战)	急性感染性疾病

随后,在媒体全方位、高强度的报道下,“战疫”隐喻迅速使人民深切地感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紧迫性。不过,各大媒体的报道用了不同的战争类型术

语来描述这场“战疫”,主要有“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当然,不同的战争类型术语强调了疫情的不同情况。以“人民战争”为例,既然是人民

战争,政府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被战争隐喻框架赋予合理性、正当性。而且,战争隐喻的合理化功能在社会高度恐慌时期更加奏效^[19],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号召、团结人民大众,不惜牺牲一切代价为“战胜共同的敌人”而英勇奋战。在抗疫过程中,“人民战争”隐喻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的参与感,并赋予其崇高的使命感。

此外,“阻击战”是新冠肺炎疫情战争隐喻的主要源域,也是在各大媒体报道中使用次数最多的战争类型术语。作为“防御战”的一种,“阻击战”被定义为“对进攻之敌实施阻止、迟滞或断其增援、退却等的作战行为”;“阻击战”与其核心修饰词、也是本次疫情中的高频关键词“疫情”,分别对应表2中的“非常规战争”和“防御战”,笔者将其整合为“生物阻击战”。“生物阻击战”细化了笼统的战争隐喻,在很大程度上,这一隐喻框架为这次抗疫话语及其

传播提供了支撑。

当然,所有的隐喻映射都是部分映射,源域对目的域也是部分地建构与理解^[2],目的域越复杂、抽象,往往越需要更多的源域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阐释。前文提到的其他隐喻框架(“人民战争”“总体战”)也部分地建构了人们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理解。相较而言,“阻击战”隐喻提供的映射最为系统,它在抗疫话语中占据主导地位,这在表2中有直观的展示。新冠病毒是本次疫情的最终敌人,由于其神秘性及它所带来的社会恐慌,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历史上的细菌战。因此,为了更加准确地描述疫情及其防控情况,根据疫情的具体类型和主要特征,以及源域和目的域之间的互动关系,笔者将战争框架和新冠肺炎疫情框架继续细化,同时将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战争隐喻细化为“生物阻击战”,见表3。

表3 生物阻击战框架和新冠肺炎疫情框架

元素	生物阻击战框架	新冠肺炎疫情框架
与者	敌军、细菌、感染者、生化战士	新冠病毒、病人、重症医护人员、官员
场地	战场、前线、指挥部、后方	武汉(湖北)、医院、疫情防控中心
物资	防毒面具、生化服装、生化武器	医用口罩、防护服、护目镜、消毒药物/剂、人工肺、呼吸机、疫苗
过程	开战、防御/进攻、胜利	暴发、抗疫、结束
目的	杀死细菌,保护人民	杀死病毒,保护人民
方法	封闭战区	封城、隔离、核酸检测
类型	细菌阻击战	病毒预防、灭杀
特征	感染性强、致死率高、早期隐蔽性强、容易引起恐慌	传染性强、致死率较高、早期隐蔽性强、容易引起恐慌

这类战争的敌人往往是病毒或细菌,属于没有硝烟、看不见敌人的战争,很难察觉但蔓延很快,因此需要将战区封锁,对其发起阻击战;为了阻止其他人感染,受害者需要隔离;消灭这些敌人最有效的武器是疫苗,战士具备专业的生物知识,他们作战时需要口罩、防护服等特殊保护。此外,这类战争往往是不宣而战的,容易引起社会恐慌。“生物阻击战”隐喻框架中的这些元素或特点在新冠肺炎疫情中都有充分的对应,它们建构了政府在疫情防控中的话语。因此,战争隐喻直接或间接地建构了公众对疫情的认知,进而赋予新冠肺炎疫情之非常举措以合理性和正当性,从而形成令行禁止、有呼必应的局面,为疫情的有效防控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持。

2. 新冠肺炎疫情战争隐喻框架的元素分析

前文提到,战争隐喻框架最主要的元素包括参与者、物资和场地,它们在疫情防控话语中都有充分体现。

例5 你们选择来院隔离和治疗,克服了诸多困难,你们不仅是对自己的保护,更是对他人生命的承诺,本身就是英雄的行为。我们感谢你们的积极配合,感谢你们的支持理解,也感谢你们与我们一起并肩作战,打败共同的病毒敌人! (《人民日报》,2020-03-04)

例6 科学研究本身,并没有快速制胜的“特效药”。药物和疫苗的研发、生产、应用,均需遵循科学规律。(《人民日报》,2020-03-04)

因此,疫情阻击战的敌人是新冠病毒,战士是医护人员(也包括患者),目前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是隔离和治疗,最有效的抗疫武器是药物和疫苗。就“场地”元素而言,战争框架中主要是战场和指挥部。在此框架下,作为疫情暴发地,武汉被称为“决胜之地”“主战场”“阵地”“前线”等。一般而言,战争中(特别是战场)的指挥中心称作指挥部,也称司令部(headquarter),它是发号施令、重大决策的诞生

地。疫情初期,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迅速成立了指挥中心,这些指挥中心都采用了非隐喻的用法——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例7 李克强主持召开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人民日报》,2020-02-21)

例8 3月2日晚,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三十六次会议、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第六次会议召开。(《北京日报》,2020-03-03)

相比之下,湖北省和武汉市政府分别于1月20日和22日成立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中心采用了隐喻用法——指挥部。

例9 省委书记、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指挥长应勇又主持召开疫情防控视频调度会。(《湖北日报》,2020-02-17)

例10 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下发文件,对新冠肺炎患者治疗费用予以明确。(《湖北日报》,2020-03-17)

这一细节充分反映出湖北省(尤其是武汉市)作为新冠肺炎的暴发地,是疫情防控的核心区域,成为防疫战争的最前沿,这在媒体报道中十分突出。在战争隐喻框架下,根据隐喻映射不变原则,武汉成为战争的主战场、最前线、决战决胜之地;同时,在战争隐喻的压制下,武汉市疫情领导小组被命名为“指挥部”。此外,“战疫指挥部”的建立充分体现了武汉新冠肺炎疫情之紧急,迅速构建了基于战争隐喻的抗疫现实,进而为“封城”的合理性提供了重要依据。

对比分析了参与者、场地、物资和方法等重要元素在战争框架和疫情框架之间的对应(即映射),以及由此给疫情防控带来的精神层面的支持,可以得出,以上元素最大的功能就是充分渲染新冠肺炎疫情的紧急性,由此给公众带来一定程度的恐慌;过程元素则鼓舞全民的抗疫斗志,使得公众对战疫充满信心,对最终消除病毒充满希望。

3. 新冠肺炎疫情战争隐喻中的推理投射

疫情战争隐喻绝非新冠肺炎疫情和战争之间、或它们的构成要素及其结构/关系上的简单比较,更重要的是它将与战争有关的推理模式映射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上。离开战争隐喻的推理模式,政府部门和媒体很难对新冠肺炎疫情做出准确的论述,政府部门很难做果断、全面的部署,社会大众也很难体会到疫情带来的紧迫性和恐惧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战争隐喻为疫情防控提供了话语框架,为取得防控疫情的全面胜利所采取的非常规举措赋予了

合理性和正义性,这也是政府话语权力建构的突出表达方式。

新冠病毒的神秘性为战争隐喻提供了作用的空间,战争隐喻为疫情提供了有力的范畴化工具。神秘性是隐喻的滋生地,而新冠病毒的神秘性不言而喻:没有硝烟,看不见敌人,病毒源头尚未确定,传播途径不完全确定,尚无特效药。战争隐喻将战争的推理模式映射给新冠肺炎疫情,并将其概念化为战争。既然是战争,就必然包含敌我双方,即新冠病毒/新冠肺炎疫情(敌人)和重症医护人员(战士)。细化的“生物(病毒)阻击战”更是把疫情看成是新冠病毒对人民健康发起的侵略战争。因此,救治病人、保卫人民健康的行为被概念化为病毒阻击战,进而为赢取战疫所采取的非常举措赋予合理性。

战争隐喻能够降低医护人员和民众伤亡带来的舆论压力,提高公众对政府疫情防控的支持力度。在战争这种紧急状态下,牺牲再大,也不为过^[1]⁸⁸。既然是战争,就有战士牺牲,就有民众伤亡,那么保卫人民安全的“战疫”就是正义的战争。因此,奔赴疫区的抗疫人员被视为英雄,抗疫中牺牲的人员被迫授为烈士;反之,一切不支持战疫或破坏战争成果的人员和行为则被概念化为非正义,甚至是敌人(比如漏报、瞒报疫情现象)或逃兵(比如托病不参加抗疫的现象)。

三、新冠肺炎战争隐喻的积极影响

从疫情防控的层面看,唤起大众心中的恐惧感是战争隐喻的基本功能^[11,20],它能够充分突显目的域所描述事件带来的威胁^[21]。当然,这种恐惧感和威胁有其积极意义。在处理类似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公共卫生事件中,它能够有效地抓住大众的注意力,使其迅速地对当前的紧急状况形成相对正确的认知,改变目前所处的生活状态,进而促使其接受政府就当前的紧急情况所传递的信息,并采取相应的举措。即使在和平年代,当人们思维进入战时状态之后,也会下意识地调用战争的逻辑思维来看待当前的紧急状况而不感到过度的突兀^[22]。

第一,战争隐喻在抗疫过程中有助于发挥国家制度治理优势。命令在战争中贯彻执行最为彻底,而且是绝对服从。“疫情就是命令”,战争隐喻将命令的强制性、权威性和指挥性投射到疫情上,从而形成令行禁止、有呼必应的局面,为新冠肺炎疫情的有效防控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持,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第二,战争隐喻有助于鼓舞人民的抗疫士气,提

供必要的精神支持。战争往往带来人民伤亡,所以保卫人民安全的“战疫”是正义之战,一切为赢取战争而采取的行为都被赋予正义性。因此,战争隐喻有利于最大限度地鼓励医务人员及全体人民积极抗疫,并增强其参与感,赋予其崇高的使命感。

第三,战争隐喻有助于促进全球共同抗疫。在疾病战争隐喻框架下,新冠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世界各国唯有相互支援、团结合作才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共同保护各国人民的生命安全。

四、结语

作为突发的强传染性流行病,新冠肺炎已经超出了疾病的范畴,进而演变为由新冠肺炎引起的公共卫生事件。中国政府顶住国内经济下行、国外舆论批评的压力,果断实行了封村/社区、封城等各项重大举措,最大限度地切断了新冠病毒的传播途径,有效阻断了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这些重大举措的顺利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战争隐喻。首先,由于战争隐喻图式已经成为大众的底层认知,使用战争框架来论说新冠肺炎,大大简化了大众对新冠肺炎的认知过程,使其充分了解新冠肺炎的危害性与紧迫性。其次,战争隐喻将有关战争的推理模式和叙事方式迁移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上,构建了基于战争隐喻的抗疫现实,使得公众对新冠肺炎疫情形成了战争的认知。再次,战争隐喻框架赋予新冠肺炎疫情之非常举措以合理性和正当性,从而形成令行禁止、有呼必应的局面,为疫情的有效防控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持。因此,战争隐喻极大地激起了全民抗疫的热情,进而激励人们采取相应的行动。能在最短时间内构筑起全民积极战“疫”的局面,战争隐喻功不可没。

参考文献:

- [1] 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M]. 程巍,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 [2] 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3] LAKOFF G, JOHNSON M.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 [4] BELL C. War and the allegory of medical intervention: why metaphors matter [J].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 2012(3): 325-328.
- [5] 刘涛. 隐喻论: 转义生成与视觉修辞分析[J]. 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学报), 2017(6): 140-148.
- [6] LANDAU M J, KEEFER L A, ROTHSCILD Z K. Epistemic motives moderate the effect of metaphoric framing on attitudes [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014(53): 125-138.
- [7] MUSOLFF A. The study of metaphor as part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J].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2012(3): 301-310.
- [8] THIBODEAU P H, BORODITSKY L. Metaphors we think with: the role of metaphor in reasoning [J]. Plos one, 2011(2): 1-12.
- [9] 刘宇红,余晓梅. 现代汉语中的军事隐喻研究[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7(3): 12-20.
- [10] 杨洋,董方峰. “医疗即战争”隐喻的认知话语研究[J]. 外国语文研究, 2007(3): 12-20.
- [11] FLUSBERG S J, MATLOCK T, THIBODEAU P H. Metaphors for the war (or race) against climate change [J].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2017(6): 769-783.
- [12] DIJK V T A. Ideology and discourse analysis [J].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2006(2): 115-140.
- [13] FILLMORE C J. Frames and the semantics of understanding [J]. Quaderni di semantica, 1985(2): 222-254.
- [14] FILLMORE C J. Merging frames [M]//FAVRETTI R R. Frames, corpora and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Bologna: Bologna University Press, 2008.
- [15] LAKOFF G. Don't think of an elephant! [M]. White River Junction: Chelsea Green Publishing Company, 2004.
- [16] WEHLING E. Politics and framing: how language impacts political thought [M] // COTTER C, PERRIN 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media.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 [17] ENTMAN R M. Framing: toward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 [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93(4): 51-58.
- [18] WIGGINS N M. Stop using military metaphors for disease [J].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2012(345): e4706.
- [19] MIO J S. Metaphor and politics [J]. Metaphor and symbol, 1997(2): 113-133.
- [20] Coleman M P. War on cancer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medical - industrial complex [J]. Journal of cancer policy, 2013(3/4): e31-e34.
- [21] BARTOLUCCI V, GALLO G. Terrorism, system thinking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J]. Systems research and behavioral science, 2015(1): 15-27.
- [22] FLUSBERG S J, MATLOCK T, THIBODEAU P H. War metaphors in public discourse [J]. Metaphor and symbol, 2018(1): 1-18.

[责任编辑 亦 筱]